

## 《史記》與《詩》關係的研究概況

金秀吳\*

### <目次>

1. 序論
  - (1) 選題動機
  - (2) 現代學者的相關研究
2. 《史記》有關《詩》的論述及相關研究
  - (1) 三家詩的流傳情況以及詩說異同
  - (2) 《史記》與《毛詩序》之間的關係
3. 《史記》在詩經學史上引起爭議的一些問題
  - (1) 孔子刪《詩》說
  - (2) “四始說”
  - (3) 《商頌》的創作年代
4. 司馬遷的《詩》學觀
  - (1) 司馬遷的《詩》學淵源
  - (2) 以《詩》為史
  - (3) 以美刺諷諭論《詩》
5. 結論

## 1. 序論

### (1) 選題動機

本文的寫作主要源於陳桐生《史記與詩經》<sup>1)</sup>這本書的啟發，在閱讀的過程中，我認識到《史記》中有不少內容涉及到《詩經》學的問題。考察一些資料之

後，又發現《史記》中有關《詩》的記載，不僅是作為先秦至西漢《詩》學的重要資料來源而受到重視，而且其中的一些論述，至今在學術界仍然爭論紛紜。雖然陳桐生的著作作用很大的篇幅對《史記》與《詩經》的關係進行了多方面的探討，但在他之後發表的幾篇論文，如董治安《〈史記〉稱〈詩〉平議》<sup>2)</sup>中的觀點，仍然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具體情況將在下節論述)。由此可看出對《史記》所引《詩經》資料的研究尚未明朗，仍需要找出新的證據補充強化各家觀點。因此本文試圖對以往的主要研究成果作一個整理、總結，希望可以為進一步研究《史記》與《詩經》關係提供參照。

### (2) 現代學者的相關研究

自《史記》問世伊始，其關於《詩》的論述就得到了歷代學者的關注，但他們的論述多為隻言片語，沒有專門針對這兩者之間的關係，所以相關見解較為零散。近現代以來才出現了對《史記》與《詩經》關係的專門研究。最近出版的《史記研究集成》<sup>3)</sup>收錄了有關司馬遷與《史記》的主要古今論文論著，但在有關《史記》與《詩經》關係方面的介紹就比較薄弱，僅收錄了蔣立甫《略說司馬遷與〈詩經〉研究》一文。另外，在第十卷第五章中《〈史記〉與經學》之下，分別設立若干小節，專門介紹有關《史記》與《周易》、《尚書》、《春秋》、《左傳》之間關係的研究，而未給《史記》與《詩經》另設一節。因此本節要對近現代以來以《史記》與《詩經》的關係為主題的專門研究作簡單介紹。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金德建《司馬遷所見書考》<sup>4)</sup>，將《史記》所依據的典籍以及司馬遷對這些典籍的評論，進行總結歸納。其中《詩經》的部分主要分五個章節探討，其具體章節為：第二章《論孔子整理〈詩經〉去其重複》、第三章

2) 董治安, 《〈史記〉稱〈詩〉平議》, 《兩漢文獻與兩漢文學》(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年版), 169-187頁。

3) 張大可、安平秋、余樟華主編, 《史記研究集成》(華文出版社, 2005年版)。

4) 金德建, 《司馬遷所見書考》(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3年版)。

\* 北京大學 中國語言文學系 博士研究生。

1) 陳桐生, 《史記與詩經》(人民文學出版社, 2000年版)。

《〈史記〉“四始”說批判》、第四章《論申公〈詩訓〉的性質》、第五章《〈史記〉所引〈詩經〉系〈魯詩〉說》、第六章《〈韓詩內外傳〉的流傳及其淵源》。第二、三、五章主要涉及《史記》中與《詩》有關的論述及其引起的爭論，第四、六章主要對《史記》所記載的漢代《詩》學流派情況進行考察，另外第五章還探討了司馬遷的《詩》學淵源問題。金德建的著作比較全面地涉及了《史記》與《詩》之間的多方面內容。

一九九四年，蔣立甫發表《略說司馬遷與〈詩經〉研究》<sup>5)</sup>一文。這篇文章所涉及的內容，《史記研究集成》<sup>6)</sup>中已詳細介紹。此文在系統論述“四始”、《商頌》、孔子刪詩說等基本爭論問題之外，還探究了“《史記》說《詩》、用《詩》給予後世研究的啓發”。他指出司馬遷對《詩》的敘述有三方面，即關於詩篇的時代或本事、對《詩經》內容的概括和“發憤說”。他還指出司馬遷用《詩》，主要在“取史材於《詩》”、“引《詩》證史”的方面。蔣先生的這一研究，深層次地挖掘出《史記》中有關《詩》的多方面內容，為《史記》與《詩經》關係的研究開闢了新的視野。

張家英的《〈史記〉與〈詩經〉》<sup>7)</sup>一文，有一個特點值得一提，即主要運用統計學的研究方法，分析《史記》引《詩》情況。張家英通過文本比較分析，發現今本《史記》所引詩句存在前後不統一的現象，例如《魯頌·閟宮》篇“戎狄是膺，荊楚是懲”之句，《史記》中出現三次；《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引作“戎狄是膺，荊楚是懲”；《匈奴列傳》引作“戎狄是應”；《淮南衡山列傳》引作“戎狄是膺，荊楚是懲”，與《毛詩》相同。張家英由此認為：“《史記》中的這種不一致，說明司馬遷不可能是兼學過三家詩的”。其實在張家英之前，王先謙在《詩三家義集疏》<sup>8)</sup>中也注意到《史記》引《詩》中的文字不統一現象，認為“《建元以來侯

者年表》引《詩》：“戎狄是應，荊楚是懲”，史遷治《魯詩》，此《魯》作‘應’、作‘茶’異文之證。《淮南衡山列傳贊》引《詩》，仍與《毛》同，疑後人所改”。張家英對此觀點也有評價，認為“王氏可能沒有對《史記》中的引《詩》通盤考慮過”。但筆者個人認為王氏的考慮已經十分周全。王氏“疑後人所改”的觀點，是在判定司馬遷尚未看《毛詩》的前提之下得出的結論，但現在的研究對司馬遷是否見過《毛詩》的問題上尚未有定論，在這種情況下，王氏的觀點，似乎根據不太充分。再就張家英的觀點而言，張家英只依據今本《史記》引《詩》中的文字不統一現象，即認為：“司馬遷不可能是兼學過三家詩的”，難免存在可疑之處。

二〇〇〇年，陳桐生在《史記與詩經》這一著作中，“對舊學案在前人的基礎上作出進一步的探討”，並“儘量開拓前人沒有涉足過的新領域”<sup>9)</sup>。他在前人基礎上作出進一步探討的，有“司馬遷的《詩》學淵源”、“刪《詩》說”、“四始”、“《商頌》”等問題。陳桐生特別運用西方闡釋學理論來剖析“刪《詩》說”以及被《史記》所吸取的《詩經》裏的一些思維方式，這一點可以說是他所開拓的“新領域”。但陳桐生運用西方闡釋學理論對揭曉“刪《詩》說”之謎是否恰切，以及對《史記》吸取《詩經》思維方式的論述是否妥當，仍待考查。

二〇〇四年，張強在《司馬遷學術思想探源》<sup>10)</sup>第五章第三節中探討了“司馬遷與《詩經》”的關係。其中值得指出的是，張強在推導出“孔子論《詩》”的思想直接影響到司馬遷治《詩》的思想這一結論時，以楚簡《孔子詩論》為體現孔子《詩》學思想的主要依據，並由此來論述孔子《詩》論對司馬遷的影響。這就在運用資料的範圍上有所突破。但《孔子詩論》的作者和成書時代有待進一步的研究，在此情況下，直接把《孔子詩論》作為孔子《詩》論是否確切，還有待商討。

二〇〇五年，董治安在《兩漢文獻與兩漢文學》第一輯中收錄了《〈史記〉稱〈詩〉平議》<sup>11)</sup>一文。其中對“司馬遷《詩》學淵源”等問題上的一些觀點，與其他學者相當不同（具體差異將在下節論述）。董治安在文後附《〈史記〉稱

5) 蔣立甫，《略說司馬遷與〈詩經〉研究》，《人文雜誌》第6期，1994年。蔣立甫將同樣的論文以《司馬遷與〈詩經〉研究述議》的篇名發表在《安慶師範學院學報》（1994年第三期）上。本文引用以前者為準。

6) 張大可、安平秋、余樟華主編，《史記研究集成》第九卷（華文出版社，2005年版），394-396頁。

7) 張家英，《〈史記〉與〈詩經〉》，《哈爾濱師專學報》，1996年第1期。

8) 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中華書局，1987年版），1084頁。

9) 陳桐生，《史記與詩經·前言》（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年版），1頁。

10) 張強，《司馬遷學術思想探源》（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11) 董治安，《兩漢文獻與兩漢文學》第一輯，《〈史記〉稱〈詩〉平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188-201頁。

〈詩〉綜錄》，彙集《史記》引《詩》、論《詩》以及有關《詩》史的全部文獻資料，對於初步認識《史記》與《詩經》關係是一個便捷的途徑。

近現代以來《史記》與《詩經》關係上的研究，在研究內容和方法上都越來越豐富，這說明《史記》裏有關《詩經》的材料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蘊和廣闊的解釋空間，有待今後的學者作更進一步的縱深探討。

## 2. 《史記》有關《詩》的論述及相關研究

### (1) 三家詩的流傳情況以及詩說異同

《史記》有關三家詩的記載在《詩經》學史上是很有價值的材料。司馬遷在《儒林列傳》中言及《魯詩》與《韓詩》。關於《魯詩》，《史記》有言：“申公獨以《詩經》為訓以教，無傳(疑)，疑者則闕不傳”<sup>12)</sup>。梁玉繩《史記志疑》認為：“疑字衍，《漢書》無之，謂申公不作《詩》傳，但教授也”<sup>13)</sup>，而金德建則認為梁玉繩的觀點難以成立，“疑者則闕不傳”已經表明，“凡屬於並沒有什麼疑義的一些詩篇”<sup>14)</sup>，申公當時還是曾經寫下來的，以此主張申公作過《詩傳》。關於《韓詩》，《史記》亦有言：“韓生者，燕人也。孝文帝時，為博士。景帝時，為常山王太傅。韓生推詩之意，而為《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其歸一也。淮南貢生受之。自是之後。而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韓生孫商，為今上博士”<sup>15)</sup>。而至於《齊詩》傳承、《詩》說等情況，《史記》沒有提及。金德建對此推測到：“《史記》裏所以沒有再說起齊後蒼或者轅固生已經著述流傳的話，可能《齊詩傳》的著於竹帛，時間上要遲一個時期。…司馬遷那時候僅僅只

有齊詩的口說流行。…所以總的來看，傳授《詩經》的各個家派當中，司馬遷當時曾經的確看見過有書本的《詩傳》，照理應當是只有申公和韓嬰這二家的書。至於《毛詩故訓傳》那是後來很遲才出現的”<sup>16)</sup>。其說頗為合理。

有的學者通過分析《史記》中具體解《詩》的內容，還歸納出三家詩與《毛詩》以及三家詩之間的異同。其中的主要根據，即司馬遷對《關雎》、《鹿鳴》篇的記述。有關《關雎》篇的論述，於《十二諸侯年表》曰：“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sup>17)</sup>；《儒林列傳》曰：“周室衰而《關雎》作”<sup>18)</sup>。據陳桐生的分析，自先秦至漢對《關雎》主旨的理解經歷了三次變遷。先秦典籍取《關雎》娛樂嘉賓之義，漢初三家詩解釋為刺康王，而《毛詩》將它解釋為歌頌後妃之德，將三家詩的刺詩改為美詩。《十二諸侯年表》還提及《鹿鳴》篇：“仁義陵遲，《鹿鳴》刺焉”<sup>19)</sup>，而先秦典籍以及《齊》、《韓》、《毛詩》，皆將《鹿鳴》看作是演樂群臣嘉賓的詩篇。惟獨《魯詩》認為《鹿鳴》篇的題旨是風刺在上位者不能養賢之義。由此亦可知《史記》中對《鹿鳴》篇的看法是依據《魯詩》而來的。

### (2) 《史記》與《毛詩序》之間的關係

《毛序》的寫作時間，是自古以來《詩經》學中爭論最多的問題之一。先秦兩漢的典籍是辨明《毛序》寫作時間的主要材料，《史記》即為重要的材料之一，但對於司馬遷是否見過《毛序》的問題，學者的觀點則各不相同。

張啓成在《〈毛詩序〉非一人一時之作》<sup>20)</sup>一文中，認為司馬遷未曾見過《毛詩序》，更認為《毛詩序》中的一部分內容乃比附《史記》而作：“《毛序》之說，各位晉侯先後出現的時間與《史記·晉世家》完全一致，這是《毛序》

12) 《史記》卷一二一，《儒林列傳》卷六一。本文所引《史記》據中華書局，1982年版。

13) 梁玉繩，《史記志疑》卷三五(中華書局，2006年版)，1437頁。

14) 金德建，《司馬遷所見書考論申公〈詩訓〉的性質》(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41頁。

15) 《史記》卷一二一，《儒林列傳》卷六一。

16) 注17)，42頁。

17) 《史記》卷十四，《十二諸侯年表》第二。

18) 《史記》卷一二一，《儒林列傳》卷六一。

19) 《史記》卷十四，《十二諸侯年表》第二。

20) 張啓成，《〈毛詩序〉非一人一時之作》，《貴州文史叢刊》，2003年第三期。

比附《晉世家》的證據之一”。又云：“《毛詩序》中涉及《左傳》與《史記》的《詩序》，不可能是毛亨、毛萇所作，西漢偏晚的徐敖、陳俠，東漢時期的謝曼卿、衛宏等，當是《毛詩序》不斷充實完善的重要人物”。按照張啓成的說法，《毛詩序》的基本完成在《史記》之後，大約在“西漢偏晚”和“東漢時期”。

而王洲明則對張啓成“《毛序》比附《史記》而作”的觀點持懷疑態度：“司馬遷寫《史記》借鑒、參考各諸侯國的史記是肯定的。既然司馬遷尚能見到各諸侯國的史記，那麼，漢初的《詩序》的作者也能見到，是一點也不奇怪的。因此也就不能說一定是東漢的衛巨集根據《史記·晉世家》的記載而作的《毛序》了”。他通過對《左傳》與《史記》中相關《詩經》的資料進行考察對比，得出的結論為：“《毛序》不可能依據《史記》而成，《毛序》的基本完成，不會晚至西漢偏晚和東漢時期”<sup>21)</sup>。後來，王洲明再次主張《毛序》基本完成於《史記》之前<sup>22)</sup>。他雖然多次反駁了《毛序》比附《史記》而作的看法，但沒有涉及到司馬遷見過《毛序》的問題。

### 3. 《史記》在詩經學史上引起爭議的一些問題

#### (1) 孔子刪《詩》說

歷代學者都非常重視《史記》中記錄的有關孔子的《詩》論。其中爭議最大的，就是孔子刪《詩》說，主要源於《孔子世家》中的一段話：“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後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曆之缺，始於衽席……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

21) 王洲明，《從〈左傳〉與〈史記〉稱〈詩〉引〈詩〉的對比研究看〈毛序〉的作期》，《河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28卷第5期，2005年9月。

22) 王洲明，《從〈漢書〉稱〈詩〉論定〈毛詩序〉基本完成於〈史記〉之前——兼答張啓成先生的商榷》，《河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30卷第3期，2007年5月。

《雅》、《頌》之音”<sup>23)</sup>。瀧川資言在《史記會注考證》中綜合列舉了歷代對孔子刪《詩》說提出看法的主要人物以及他們的立場：“孔子刪《詩》之說，始見於此。是之者，歐陽修、王應麟、鄭樵、顧炎武、王崧諸人；非之者，孔穎達、朱熹、葉適、朱彝尊、王士禛、趙翼、崔述諸人”<sup>24)</sup>。可見歷代學者對孔子刪《詩》說，一直以來意見不一、針鋒相對。現在學術界大多否定孔子刪《詩》說，部分學者對刪《詩》說予以辯證性的肯定。如金德建、蔣立甫通過重新考究《史記》“去其重”的意思，調整“刪《詩》說”的說法。他們認為孔子只是整理重複的詩篇，並沒有做過刪省的工作。其中，金德建認為：“把三千余篇整理成爲三百五篇，這項工作孔子做過，但不必認爲開始於孔子。孔子以前，便有正考父這個人，可以考見是和孔子同樣地整理過《商頌》。…孔子只代表做過這項整理工作的人，而且也是最後的一個”<sup>25)</sup>。蔣立甫支持這一說法：“刪《詩》說是後人強加給司馬遷的”<sup>26)</sup>。而陳桐生、張強等學者則試圖爲“孔子刪《詩》說”的出現找出根據，如陳桐生在《〈史記〉與〈詩經〉》中，擴展解釋角度，從漢代社會文化背景的角度分析司馬遷提出孔子刪《詩》說的緣由。再如張強認為：“仔細分析司馬遷敘述孔子刪《詩》時的這段話語，應該說，司馬遷的主旨並不是強調孔子刪《詩》一事，而是企圖借助於刪《詩》一事突出孔子治《詩》‘取可施於禮義和以備王道’的思想”<sup>27)</sup>。後二人的解釋主要側重於將孔子刪《詩》說與司馬遷的學術文化思想相聯繫。

#### (2) “四始”說

金德建認為司馬遷沒有明確提出所謂的“四始”說，而《毛詩序》中“是謂四始，詩之至也”才是“四始”說真正的開始。雖然如此，但還是可以從《史記》裏找

23) 《史記》卷四七，《孔子世家》第十七。

24) 瀧川資言，《史記會注考證》卷四七(臺灣宏業書局，1992年版)，742頁。

25) 金德建，《司馬遷所見書考二論孔子整理〈詩經〉去其重複》(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34頁。

26) 蔣立甫，《略說司馬遷與〈詩經〉研究》，《人文雜誌》第6期，1994年。

27) 張強，《司馬遷學術思想探源》(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355頁。

出“四始”說產生的起因。金德建根據《十二諸侯年表》“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仁義陵遲，《鹿鳴》刺焉”的論述，推斷出“這種四始的說法具有‘王道興衰觀念’的可能性<sup>28)</sup>”，但對於四始說可能具有的文化內涵，未進一步分析。陳桐生則試圖解讀四始說的文化內涵：“由於漢人認為《詩經》代表了一種王道文化傳統，因而四始所標舉的重視婚姻倫理、養賢、尚德、崇孝四大主題，深刻地影響到司馬遷地《史記》著書，滲透到《史記》的內容之中”。陳桐生的解讀角度確實擴大了四始的解釋面，“四始”的文化內涵確實是從漢代文化而來的，即是在漢代文化大背景之下的產物，但陳桐生不僅把漢代的倫理觀念全部歸屬到“四始”說的內涵中，進而主張《史記》受“四始”說的影響深遠，這就不免誇大了“四始”說的影響力。

據馮浩非《歷代詩經論說述評》可知，歷代關於四始的論述有三種類型：《毛詩》說、《史記》說、《詩緯》說<sup>29)</sup>。《史記》說的主要依據為《孔子世家》的論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這一說被認為是《魯詩》之說。清代魏源繼承《史記》、《魯詩》之說，並進一步補充論述：“其《魯詩》論四始，但舉首篇者，猶《毛詩·周南·關雎》訓傳舉首篇以統全國之風，非但以三篇為始，但觀於首三篇，而知以下周公、文王之詩，皆同正始之例，《韓》義即《魯》義也”<sup>30)</sup>。馮浩非指出以《史記》說為代表的《魯》說(包括《韓》說)與《毛詩》說的不同之處在於：“《毛詩》說只從四類詩劃分的本身出發進行推解；而《魯》說則着眼於對《詩》分四類的進一步細節的推解”，即《史記》“四始”說傾向於“四者之外更求為其始者”。

### (3) 《商頌》的創作年代

《史記》中關於《商頌》的記載見於《宋微子世家》：“宋襄公之時，修行

28) 金德建，《司馬遷所見書考三·〈史記〉“四始”說批判》(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38頁。

29) 馮浩非，《歷代詩經論說述評》(中華書局，2003年版)，125頁。

30) 魏源，《詩古微·四始義例篇二》(岳麓書社，1989年版)，225頁。

仁義，欲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這段話認為《商頌》五篇是宋襄公時所作。而相傳為春秋時期左丘明所作的《國語》則認定《商頌》作於殷商時代：“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于周太師，以《那》為首。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sup>31)</sup>”。後來關於《商頌》的創作年代問題，主要就是圍繞《史記》說和《國語》說展現的。其中，贊同《史記》說的學者，主要有魏源<sup>32)</sup>、皮錫瑞<sup>33)</sup>、王國維<sup>34)</sup>。但贊同《國語》說、反對《史記》說的學者占絕大多數。那麼學者怎麼分析《宋微子世家》的說法呢？有的學者將《史記》的說法理解成《國語》說。如金德建說：“正考父作《商頌》的實際情況就是指他的校《商頌》，把原來的《商頌》加以一番整理成書的功夫，定著為五篇”<sup>35)</sup>。其看法反映司馬遷的說法正是與《國語》的說法相同，只是對那些《頌》詩加以校讎和寫定。另有不少學者指出司馬遷確實認為《商頌》是宋人正考父所作，並對此進行反駁。如從正考父的年齡方面考證，認為只有正考父享年一百五十多歲，而且當時還得具備創作能力，這樣“《商頌》為宋詩說”才可以成立，但這一可能性幾乎不可能存在。再如從文勢方面考察《商頌》高古奧險的特點，以判定《商頌》非春秋時人所作，這一分析也有助於反駁“《商頌》為宋詩說”的看法。

有的學者進一步論述了《史記》說產生的背景。如蔣立甫《略說司馬遷與〈詩經〉研究》說：“司馬遷之所以認定《商頌》為宋人正考父所作，是因為劉德剛獻《毛詩》於朝廷，當時還未受到社會重視，司馬遷或許還不曾讀過，而他所習之《魯詩》及已立學官的《韓詩》、《齊詩》皆以為《商頌》是宋襄公時詩，因此也就沒有深究，只是採用了當時通行的一種說法而已”。陳桐生則增添文化因素進行闡釋。他說：“《魯詩》以孝說《頌》，而宋襄公有光大祖宗事業的美好願望，所以《魯詩》將《商頌》的創作年代確定在宋襄公時代”，而司馬遷沿襲

31) 《國語》卷五《魯語下》，“閔馬父笑子服景伯”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216頁。

32) 魏源，《詩古微上編之六·通論三頌商頌魯韓發微》(岳麓書社，1989年版)，403頁。

33) 皮錫瑞，《經學通論》(中華書局，1995年版)，44、45頁。

34) 王國維，《觀堂集林》(中華書局，2004年版)，114頁。

35) 金德建，《司馬遷所見書考二論孔子整理〈詩經〉去其重複》(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36、37頁。

了《魯詩》的說法。

#### 4. 司馬遷的《詩》學觀

##### (1) 司馬遷的《詩》學淵源

歷代學者大多認為司馬遷關於《詩經》的說法是源自《魯詩》一派。其代表學者有全祖望、陳橋樑等。陳橋樑《魯詩遺說考》卷一曰：“《史記·敘傳》自言：‘講業齊、魯之都，子長宜習《魯詩》。’又《儒林傳》言：‘韓嬰為《詩》與齊、魯間殊，似不深信韓氏。且子長時《詩》惟魯立博士，故《史記》所引《詩》皆魯說也’，又曰：‘全氏祖望云：‘太史公嘗從孔安國問古文《尚書》，安國為《魯詩》者也。史遷所傳，當是《魯詩》’。橋樑今即以《史記》證之，其傳儒林，首列申公，敘申公弟子，首數孔安國，此太史公尊其師傅，故特先之。據是以斷，《史記》所載《詩》，必為《魯詩》無疑矣”。

金德建也同意全、陳氏的意見，認為：“他(司馬遷)純然根據當時《魯詩》一派對於《詩經》的說法，而沒有旁驚到像齊、韓等派的異說”，“《史記》裏面不會採取《毛詩序》說法的例子，原是很多”，而且還借王充的說法強調司馬遷傳授《魯詩》上的功勞，認為：“魯申公的詩說是完全靠了《史記》才得以聞顯語當世的”<sup>36</sup>。雖然“司馬遷傳授《魯詩》”的觀點一直佔據了學術界的主流，但也同時存在與此不同的看法。《太史公自序》：“序略，以拾遺補藝，成一家之言，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俟後世聖人君子”，《索隱》注曰：“異傳者，如子夏《易傳》、毛公《詩》及韓嬰《外傳》、伏生《尚書大傳》之流者也”。《正義》注亦因襲了《索隱》說。可以看出司馬貞和張守節不甚注重司馬遷與《魯詩》的關係。黃虞稷《千頃堂書目》中有“《史記事毛詩序考》十卷”，

這表示明代有學者還認為司馬遷《詩》說受到《毛詩》的影響。可見對司馬遷的《詩》說的淵源，歷代學者的看法並不是完全一致的。

張強認為：“司馬遷治《詩》有兩個來源，一是上承孔子；一是近襲漢代《詩》學。所謂上承孔子，是指司馬遷治《詩》以孔子論《詩》為最高思想原則，以禮樂退明王道；所謂近襲漢代《詩》學，是指司馬遷習《詩》與漢代四家詩發生千絲萬縷的關係”。張先生的看法拓展了司馬遷治《詩》問題上的解釋空間，而且進一步認為《史記》裏反映的《詩》學觀不僅僅是《魯詩》：“魏源之前，雖然有陳橋樑、王先謙、唐晏等提出司馬遷習《詩》為《魯詩》的觀點，然而將司馬遷習《詩》完全納入到《魯詩》的軌道卻有以偏概全之嫌”<sup>37</sup>。

董治安也對《史記》引《詩》上的淵源問題提出個人意見，說：“《史記》引《詩》，或與毛同，或與毛異而同於三家，或竟用魯詩，事實上並未專主一派。清代以來，有的學者籠統地把《史記》引《詩》一概視為援用魯詩，可能是基於‘司馬遷亦從孔安國問故’一語產生的一種誤解，是不足為信的。總而言之，無論是論《詩》還是引《詩》，太史公都不是一個完全的魯詩派，而是在三家詩與毛詩之間採取了一種具有所用亦具有所棄的基本態度”<sup>38</sup>。董治安的看法也是跟張強一樣，要從多層面角度剖析《史記》論《詩》的來源依據。

董治安還從《史記》引《詩》到底根據哪種學派這一問題，又提出兩個方面的疑問：“一是在最重家法的漢代治經氛圍中，怎麼會出現司馬遷兼采三家詩與毛詩的現象？二是還涉及到司馬遷之世是否已經產生毛詩和《毛詩序》的傳佈的問題”。針對第一個疑問，董治安認為：其一是早在武帝之世，三家詩並立於學官，今古文的對立尚未達於激化的程度；二是司馬遷作為歷史學家，大量引用了既有的文獻，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文獻內容、文字上的舊貌。而對於第二個問題，董先生極其贊同高亨先生在《詩經引論》中所講“《毛詩序》在毛亨作傳時已經存在了，不是毛亨所作，也不是衛宏所作，而是西漢初年人所作”的說法，認為：“司馬遷之世毛詩(《包括《毛詩故訓傳》)已在流傳”。他還補充說明在《儒林列傳》中

36) 金德建，《司馬遷所見書考五·〈史記〉所引〈詩經〉系〈魯詩〉說》(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48、49頁。

37) 張強，《司馬遷學術思想探源》(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357頁。

38) 董治安，《兩漢文獻與兩漢文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175頁。

未提及到毛詩、《毛序》的原因：“由於西漢前期毛詩未立學官，詩文的傳授、詩序的流布僅限於民間，與三家詩有所不同”<sup>39</sup>。

由此可見，對司馬遷《詩》學淵源問題的考察，隨着歷史的推移也產生了一定的變化。不僅如此，在司馬遷《詩》學淵源上的很多疑問尚未解決。如董先生也指出一個疑點：“《吳太伯世家》之‘《詩》以達意’、‘《詩》記山川溪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毛詩序》稱‘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應是太史公之所本。但費解的是，《史記》中似乎未有提及《毛詩》最突出的特點之一的‘興’觀念……”，這一點反映司馬遷和三家詩、《毛詩》之間的關係尚未解決，仍待進一步考查。

## (2) 以《詩》爲史

通過《殷本紀》“以頌次契之事，自成湯以來采於《書》、《詩》”和《孔子世家》“（《詩》）上采契、後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于衽席”等的論述，可以發現司馬遷據《詩》以考訂歷史事實的思路。

關於司馬遷以《詩》爲史的原因，陳桐生認爲：“首先是他堅信《詩經》具有權威性和最大的真實可靠性”，而“《魯詩》採取以史證《詩》的方式，爲每一首詩都找到一個具體的歷史背景，往往在說《詩》時講述一些生動的歷史背景故事……這是司馬遷取材於《詩》的又一原因”。雖然陳桐生將“以史證《詩》的方式”歸屬於《魯詩》，但其實這是漢代三家詩和《毛詩》共同的特點。但從當時文化背景考究“司馬遷以《詩》爲史”的原因，其思路是確實值得借鑒的。

另外，張強還強調了司馬遷以《詩》爲史的終極目的或效果，即認爲“在以《詩》述史的過程中，詮釋《詩》本意，以期達到宣揚德政、批判不仁、反思歷史的目的”<sup>40</sup>。

## (3) 以美刺諷諫論《詩》

重視《詩》的諷諭作用最早始於孔子。《論語·陽貨》曰：“《詩》可以怨”。孔安國注曰：“怨刺上政”<sup>41</sup>。司馬遷繼承了孔子《詩》論，強調《詩》的美刺諷諭作用，突出《詩》頌揚倫理道德、批判醜陋、陰暗的現實問題的治世精神。如《儒林列傳》：“夫周室衰而《關雎》作”；《十二諸侯年表》：“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仁義陵遲，《鹿鳴》刺焉。”；《司馬相如列傳》：“《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等，皆屬其例。

另外，司馬遷重視《詩》的諷諭作用，與一般漢儒和經學著作中所體現的含義有所不同，如董治安則認爲“司馬遷在承認（《詩》）‘可以怨’的基礎上又向前跨出了一步，進而提出了‘賢聖發憤而作《詩》’的新說”，而“所謂的‘賢聖發憤而作《詩》’，不是着眼於詩的諷諭作用和諷諭效果，而是強調了詩的創作動因和詩人‘有所鬱結’、‘憂愁幽思’的主題感受；不是著眼於追求‘人倫學’、‘教化美’、‘風俗移’之類社會和諧的美好圖景，而是強調了現實與理想的矛盾、詩人主體活動與客觀存在的對立”<sup>42</sup>。

其實司馬遷不僅強調《詩》爲發憤而作，還認爲其他一切前代賢聖的著述皆爲發憤而作，如《司馬相如列傳》中說：“相如雖多虛詞濫說，然其要歸引之節儉，此與《詩》之風諫何異？”；《太史公自序》亦謂：“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而論兵法；不偉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sup>43</sup>，這種因“意有所鬱結”而發憤著書的理解與他自身的生平遭遇有淵源關係，大抵由其坎坷不平的人生際遇導致其形成發憤著書的意念，而這種意念也就成爲他解釋《詩經》等典籍時要着重體現的觀點。

39) 同上書，176、177頁。

40) 張強，《司馬遷學術思想探源》（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367頁。

41) 轉引自何晏，《論語集解》。

42) 董治安，《兩漢文獻與兩漢文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185-186頁。

43) 《史記》卷一三〇，《太史公自序》第七〇，3300頁。

### 5. 結論

司馬遷《史記》涉及到《詩》學淵源、孔子刪《詩》、“四始”說等《詩經》學中的重要爭論問題，其中有關孔子刪《詩》說的爭論正是由《史記》的記載而引起的。因此不僅是瞭解漢代《詩》學的演變以及司馬遷的《詩》學，還是了解《詩經》學史，《史記》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文本。而其中有些部分，至今仍沒解決，學術界仍然持續分析。因此本文以《史記》裏所反映的對《詩經》的認識為研究對象，對相關的近現代研究成果予以梳理考察，間或提出個人看法。筆者希望這次對以往主要研究成果作出的整理、總結，可以為進一步研究《史記》與《詩經》關係提供參照。

#### < 參考文獻 >

梁玉繩 《史記志疑》卷三五，中華書局，2006年版。  
 皮錫瑞 《經學通論》，中華書局，1995年版。  
 王國維 《觀堂集林》，中華書局，2004年版。  
 王先謙 《詩三家義集疏》，中華書局，1987年版。  
 魏源 《詩古微上編之六·通論三頌商頌魯韓發微》，岳麓書社，1989年版。  
 司馬遷 《史記》，中華書局，1982年版。  
 陳桐生 《史記與詩經》，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年版。  
 董治安 《兩漢文獻與兩漢文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馮浩菲 《歷代詩經論說述評》，中華書局，2003年版。  
 蔣立甫，《略說司馬遷與〈詩經〉研究》，《人文雜誌》第6期，1994年。蔣立甫將同樣的論文以《司馬遷與〈詩經〉研究述議》的篇名發表在《安慶師範學院學報》(1994年第三期)上。  
 金德建 《司馬遷所見書考》，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王洲明，《從〈左傳〉與〈史記〉稱〈詩〉引〈詩〉的對比研究看〈毛序〉的作期》，《河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28卷第5期，2005年9月。

王洲明，《從〈漢書〉稱〈詩〉論定〈毛詩序〉基本完成於〈史記〉之前——兼答張啓成先生的商榷》，《河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30卷第3期，2007年5月。  
 張大可、安平秋、余樟華主編，《史記研究集成》，華文出版社，2005年版。  
 張啓成，《〈毛詩序〉非一人一時之作》，《貴州文史叢刊》，2003年第三期。  
 張強，《司馬遷學術思想探源》，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 < 국문 요약 >

司馬遷의 《史記》는 詩經學의 淵源·孔子刪詩說·四始說 등 詩經學의 중요한 쟁점을 담고 있는 문헌이다. 그 가운데 특히 孔子刪詩說은 《史記》의 문장이 바로 쟁론의 단초를 제공한 경우이다. 그러한 까닭에 《史記》는 우리가 漢代 시경학 및 사마천의 시경관을 이해하는 데 있어서 뿐만 아니라, 시경학사 전반을 고찰함에 있어서도 중요한 위치를 차지한다고 할 수 있다. 그러나 기존의 많은 연구 성과에도 불구하고, 《史記》를 둘러싼 詩經學 문제들 중 일부는 아직까지 논의가 진행되고 있으며, 학계의 일치된 견해를 도출하지 못하고 있다. 이에 본 논문은 《史記》에 나타난 詩經學 관련 문제들을 주요 연구대상으로 삼아, 그에 대한 근현대 연구성과를 정리 고찰하는 데 중점을 두었으며, 부분적으로 개인의 견해를 덧붙였다. 본 논문의 정리고찰 작업이 앞으로 《史記》와 《詩經》의 관계성을 연구하는 데 있어 참고 역할을 할 수 있기를 기대한다.

중심어: 《사기》, 《시경》, 공자산시설, 사시설, <상송> 창작년대

원고접수일	심사일정	1차수정	게재확정	출간
2008. 7. 18	2008. 8. 6	2008. 8. 20	2008. 9. 20	2008. 9. 30